

丙例 遷居不過數世，無分支，無期功旁近之親，又與本宗斷絕者，門祚單寒，無奮迹功名及以文章自顯者，尤不可無記述，以待本家之採訪。其式不拘甲乙，力求簡易，記所知，述所聞，即殘缺不成片段，且掇拾成編，待後人增補。惟丁口、年齡、疾病諸表，則不可無，葬地易於湮沒，尤宜詳記，如無力刻印，則手寫若干冊，付之子孫，人藏其一。古者以大宗統支庶，以比閭族黨之法聚人民。後世

詩論蒙拾

傅庚生

歸納古今中外文論之通義，蓋文學構成之元素，約之可得四端，曰：感情、想像、思想、形式。明其關係，別其重輕，縷析貫持，折衷文理，宜可以權衡闡論，為文章之架樑矣。第以我國歷代學藝之進展，風尚之轉移，輒如波濤之起伏，春秋之代序。操觚之士與評隲之家，亦或者矯枉以變常，或者趨陸而徇俗。是丹則非素，貴古者賤今，遂致情思文質，創作者代有偏蔽；臧否抑揚，批評者人懷繩尺。試窺察其流變，彌綸夫群言，縱萬折而千迴，終流東而趨下。風氣初開，因有所取，遂不無偏重與畸輕；風氣已成，因有所勉，乃不卹徇末以忘本。潮流方其將逝，而反動隨生；蹊徑不能另闢，必徬徨無主。一體方王，則論議偏陋；群材既備，而銓衡周洽。此其大較也。

自昔儒家思想，牢籠百代，書言詩樂，後世所宗。舜典云：「帝曰：夔，命汝典樂，教胥子。直而溫，寬而栗，剛而無虐，簡而無傲。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。」詩主言志，數語其嚆矢也。繩以聲律，期其克諧以感人心，動鬼神，而以「和」為極詣。直栗剛簡，而溫寬無虐無傲，皆條理終始於「和」之義也。

則不然，仕官而去其鄉，及罷官則無所於歸，離亂之相尋，事畜之不能給，其不能議及修譜者，勢也。雖然，祖宗邱墓，不可忘也。燕翼詒謀，不可忽也。昔五胡之亂，中原士大夫過江避難，有百家譜，見北齊書顏之推傳。此甲族也。其譜不必詳，而其氣不挫，故子孫能服膺食德延於百世，一時榮悴，豈可以定門戶之高下哉！斯義也，夫人而知之，亦夫人而能之，滙而為一，亦百家之譜也。

論語八佾云：「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及盡善也；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盡善盡美者，其言志而能臻於和者歟？

為政云：「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『思無邪』者，一似云言志之真，所謂『修辭立其誠』者也；一似云發抒之和，所謂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』者也。禮記樂記云：「詩，言其志也，歌，詠其聲也，舞，動其容也。三者本於心，然後樂器從之。是故情深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，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。唯樂不可以為偽。」是『無邪』立誠之一義也。荀子樂論篇云：「夫樂者，樂也，人情之所必不免也。故人不能無樂，樂則必發於聲音，形於動靜，而人之道聲音性術之變盡是矣。……故樂者，審一以定和者也，比物以飾節者也，合奏以成文者也。……夫聲樂之入人也深，其化人也速，故先王謹為之文。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，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。……樂姚冶以險，則民流慢鄙賤矣。……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。」是『無邪』貴和之一義也。

荀子所稱『人情』云云，謂言志也，猶今之云文學中之感情成分也。『審一定和』，謂出理性之正以統攝其情志也，猶今之云思想也。

。『比物飾節』，幾於今日之云想像也。『合奏成文』，有類於今之云形式也。文學之四元素，數語既得其髣髴矣。

先秦之論詩樂，因過於重視文學中之思想元素，故貴言『和』。荀子所以云『樂也者，和之不可變者也。』其時以爲先王立樂，旨在審一定和，以正人心，有極端尚用之觀念。是以樂論篇又云：『故樂行而志清，禮修而行成。耳目聰明，血氣和平，移風易俗，天下皆寧。美善相樂。』美出於樂，善成於禮，『樂合同，禮別異，禮樂之統，管乎人心。』可見其所謂『相樂』，在以樂之積極而感人者，輔翼禮之消極以防人者耳。論語八佾云：『子夏問曰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』何謂也？子曰：繪事後素。曰：禮後乎？子曰：起予者，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』明乎藝術之必以禮爲其實素，然後可與言詩。學詩之目的奚在？『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』（陽貨）或有學而不能用之者，『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』（子路）唯能用是尙，而其用惟和，遂亦以和爲詩樂最高之境界。『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』道乎中庸，而孔子歎之如此，宜乎儒者之重思想而貴言和也。

兩漢詩論，或續前緒，或執一端。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之論賦，云『賦之迹』，辭藻聲律也；云『賦之心』，想像靈感也。史記屈原傳採淮南王安之論云：『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悱而不亂。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』怨而遠於淫亂，是情思相濟而美善相樂之地也。長卿子長，隨其個人遭遇之異，而各明一體焉耳。

漢書藝文志云：『書曰：『詩言志，歌詠言。』故哀樂之心感，而歌詠之聲發；誦其言謂之詩，詠其聲謂之歌。故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……古者諸侯卿大夫，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時以諭其志。蓋以別賢不肖，而

觀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：『不學詩，無以言』也。』採風賦詩，闡述尚用之實也。鄭玄天譜序云：『文武之德，光熙前緒，以集大命於厥身，遂爲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，雅有鹿鳴文王之屬。及成王周公，致太平，制禮作樂，而有頌聲焉，盛之至也。本之由此風雅而來，故皆錄之，謂之詩之正經。後王稍更陵遲，懿王始受譖，享齊哀公；夷身失禮，之後邛不尊賢。自是而下，厲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壞。十月之交、民勞、板蕩、勃爾俱作。衆國紛然，刺怨相尋。五霸之末，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善者誰賞，惡者誰罰，紀綱絕矣。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，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，謂之變風變雅。』崇正懲變，隱寓賞和之旨也。至於衛宏詩序，義則多本於樂記，亦述者而非創者也。

魏晉以降，文風日盛。馳騁文學本身之美，遂以漸重形式；不復爲道術之附庸，衡文之風亦於焉鵲起。曹丕論文云：『詩賦欲麗』。陸機文賦云：『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而瀏亮，』皆其述象也。然其時雖浸以重文，未嘗減質。故子桓揭『文氣』之說，以論風格之異同；士衡敘『應感』之會，以明靈感之通塞。從未能暢曉其旨，而筆路藍縷，有足多者。下逮范曄，云『別宮商，識清濁』，洎沈約、王融、謝朓之儕，乃競爲四聲八病之論。休文答甄琛書云：『作五言詩者，善用四聲，則諷詠而流靡；能達八體，則陸離而華潔。』既貪天之功，自矜創獲，遂不免躋之過高，而摺之近竭。餘子之瞻望聲貌者，才力不足以藉此形式以達厥情思，多偏促轅下而汗顏血指。然則六朝之趨文喪質，其不果繫於世運哉！

創作之士，不識廬山；評隲之家，燭如觀火。鍾嶸詩品云：『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』文心雕龍明詩云：『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；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』咸推情性以爲本，知文學之以感情爲君也。詩品又云：『余謂文製，本須諷讀，不可蹇礙，但令清濁流通，口吻調利，斯爲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則余病未能；蜂腰鶴膝，間里已具。』論雖稍偏，因可以樂當時也。文心附會

篇云：「夫才量學文，宜正體製。必以情志爲神明，事義爲骨髓，辭采爲肌膚，宮商爲聲氣。然後品藻玄黃，擢振金玉，獻可替否，以裁厥中。斯綴思之恒數也。」以感情爲神明，以思想爲骨髓，以形式爲肌膚聲氣，彌綸之方，亦幾乎備矣。

唐代獨以詩鳴，作家輩出，而論詩者殊鮮精到之語。李白古風之一云：「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誰陳？王風委蔓草，戰國多荆榛。龍虎相啖食，兵戈逮狂秦。正聲何微茫，哀怨起騷人。揚馬激頽波，開流蕩無垠。廢興雖萬變，憲章亦已淪。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。聖代復元古，垂衣貴清真。群才屬休明，乘運共躍鱗。文質相炳煥，衆星羅秋旻。我志在刪述，重輝映千春。希聖如有立，絕筆於獲麟。」泛言復古與希聖，未見於意與深思也。杜甫之作，有涉詩理者甚多。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」（奉贈韋左丞）似能了悟於靈感之醞釀，仍有倚於意識界經驗之沾溉者。「下薄今人愛古人，清詞麗句必爲鄰，竊攀屈宋宜方駕，恐與齊梁作後塵。」（戲爲六絕句之五）似知重視創造的想像者。「才力應難跨數公，凡今誰是出群雄？或看翡翠蘭苔上，未掣鯨魚碧海。」（六絕句之四）似知詩之有陽剛與陰柔之分者。然既服膺於「鯨魚碧海」，而不足於「翡翠蘭苔」，是陟雄奇之篇而黜秀美之什也，未免偏廢。餘所論議，若「遺辭必中律」，「熟知文選理」，「晚節漸於詩律細」，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悉不過自銜加力，尤偏於詩之形式論者。豈非甘苦疾徐，輪扁轉有不可得而言者歟？

元稹、白居易論詩之旨，大抵相合。「文章合爲時而著，歌詩合爲事而作」（白氏與元九書），二語殆盡之矣。爲時爲事，原亦文學可取之題材；然若必時時有心爲此，恐輒不免因文而造情，虛構以取信。篇什愈多，果亦愈複，其辭愈乖，其情愈僞。白氏「美刺興比，因事立題」之理論詩，多坐此病而不自覺察。較之「事物牽於外，情理動於情，隨感遇而形於歎詠」之感傷詩，乃不可及。緣後者適分胸臆，而前者牽課才外也。元白之詩，多盡瘁於時事，心儀於儒家尙用

之旨者；惟其多人爲之僞，終於未窺作者之域耳。

詩至晚唐而已靡，詩論乃至晚唐而始精。司空圖之論者，眞詩論中之翹楚矣。與李生論詩書云：「文之難，而詩之難尤難。古今之喻多矣。而愚以爲辨於味，而後可以言詩也。江嶺之南，凡足資於適口者，若醯非不酸也，止於酸而已；若醢非不鹹也，止於鹹而已。中華之人，所以充飢而遽輟者，知其酸鹹之外，醇美者有所乏耳。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，宜哉！詩貫六義，則諷諭抑揚，淳蓄淵雅，皆在其間矣。……噫，近而不浮，遠而不盡，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。」詩所以抒擲者情思，然若直達其思，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感人，不得謂爲詩也，表聖所以取譬於「醢非不鹹，止於鹹而已」也。若率陳其情，可以宣己而不可以動衆，亦不得謂爲詩也，表聖所以取譬於「醯非不酸，止於酸而已」也。故將宜達內在之情感與思想，必藉助於想像之功，然後表而出之，庶幾「近而不浮，遠而不盡，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。」「諷諭抑揚，淳蓄淵雅」者，溫潤含蓄，自然而臻於純和之境，是情思訴合無間之表現也。「詩貫六義」而情思「皆在其間」者，則以詩有比興之義，可以興觀群怨，此言而彼喻，謂想像力之發揮也。明乎此，可以尋味表聖以來「味外味」之說矣。

其詩品二十四則，「比物取象，目擊道存」（許印芳詩品跋）。約略以析之，隸在感情一目者，若「雄渾」、「冲淡」、「纖穠」、「沈著」、「自然」、「含蓄」、「悲慨」數則是。隸在想像一目者，若「精神」、「縝密」、「委曲」、「實境」、「超詣」、「飄逸」、「流動」數則是。隸在思想一目者，若「高古」、「典雅」、「豪放」、「疎野」、「清奇」、「曠達」數則是。隸在形式一目者，若「洗鍊」、「勁健」、「清麗」、「形容」數則是。尤伺良齋續說云：「司空圖在唐末，不以詩名，而其詩品二十四則，深得詩家三昧。如雄渾云：『荒荒油雲，寥寥長風。超以象外，得其環中。』纖穠云：『采采流水，蓬蓬遠春，窈窕深谷，時見美人。』典雅云：『落花無言，人淡如菊。』洗鍊云：『流水今日，明月前身。』勁健

云：『行神如空，行氣如虹。』含蓄云：『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。』精神云：『生氣遠出，不著死灰。』豪放云：『真力彌滿，萬象在旁』等語，皆沈潛斯道而後得之。』創作者以情御思，能之而不必知；批評者以思即情，知之而不必能。此所以李杜之詩能超凡入聖，而論詩之作轉遜於後人也。此所以雖表聖之詩不能以名世，乃博觀約取，卒能深得詩家三昧也。宋以降，詩之途行而日隘，詩之法研而愈精，亦當作如是觀。世或譏後人不能詩而侈言法，或謂因求法而轉失詩，皆非篤論。

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云：『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，夫豈然哉？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，多喜自放於山嶺水涯之外，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，往往探其奇怪，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，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，而寫人情之難言，蓋愈窮而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』以詩爲人生苦悶之象徵，並明詩必窮而愈工之理，感情論中真知灼見之語也。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云：『蘇李之天成，曹劉之自得，陶謝之超然，蓋亦至矣。而李太白、杜子美，以英雄絕世之姿，凌跨百代，古今詩人盡廢；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，亦少衰矣。李杜之後，詩人繼作，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，獨韋應物、柳宗元，發纖穠於簡古，寄至味於淡泊，非餘子所及也。』挾詩格之淡泊天成，由詩人之高風至味，思想論中探驪得珠之選也。黃庭堅大雅堂集云：『子美詩妙處，乃在無意於文。夫無意而意已至，非廣之以國風雅頌，深之則離騷九歌，安能咀嚙其意味，闢然入其門耶！故使後生輩自求之，則得之深矣。』以『無意而意已至』爲鋪文擲藻之極則，示人咀嚙自求而資之深廣以爲入門之階，形式論中鞭辟近裏之說也。

疇日說詩而及於想像者較少，能闡其微者尤不多觀。姜夔、嚴羽之詩論所以爲舉世所稱許者，殆以此乎！白石詩說云：『詩有四種高妙：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礙而實通。曰理高妙；出自意外，曰意高妙；寫出幽微，如清潭見底，曰

想高妙；非奇非怪，剝落文采，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，曰自然高妙。』此闡文學想像之微者也。詩爲精鍊之文字，百年之木，破爲礪尊，棄其斷在溝中，不顧也。因事論心，不涉理路；賦形取象，不落言筌。必倚分想作用，抉摘竊微，然後可以言近而旨遠，似礙而實通。白石所云『理高妙』者，指此言之也。聯想恒伴感情以生，感情亦因聯想而大。情之深篤者，聯想亦遂而遠，發爲創作，初若出人之意外；細細以尋繹之，則又髣髴皆在意中。白石所云『意高妙』者，指此言之也。詩之興感，想像力已既助長之矣；將欲表現所窺見之意象爲創作時，抒情之筆，又必乞靈於想像。遂得化抽象之情思爲具體之描寫，抉陳腐之材料爲嶄新的綜合，然後發爲言文，乃克內鑿己志，外感人心，今時術語謂爲創造的想像，如此而能寫出幽微，原非易事；如清潭見底，自屬難能而可貴。白石之謂『想高妙』者，指此而言也。至如憑靈感以成詩，正陸機之所謂『方天機之駿利，夫何紛而不理？思風發於胸臆，言泉流於唇齒，紛葳蕤以駭速，唯毫素之所擬。文微微以溢目，音泠泠而盈耳』者，以其非由於意識之求索，故能『非奇非怪』；以其不必假鍛鍊之功，故能『剝落文采』；『雖效物之在我，非余力之所勳，故時撫空懷而自愧，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』，因以『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』。然則白石之謂『自然高妙』者，指靈感而言耳。

滄浪詩話云：『夫詩有別材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，多窮理，則不能極其致。所謂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者，上也。詩者，吟詠性情也。盛唐諸人，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迹可求。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爲詩，以才學爲詩，以議論爲詩。夫豈不工，終非古人之詩也；蓋於一唱三歎之音，有所歉焉。』則暢論詩之感興，取譬以喻之。『不涉理路』，母刻形露骨以表爆其思想也；『不落言筌』，忌生吞活剝以藻飾其形式也。其涉理路，落言筌，而以文字、才學、議論爲詩

者，皆下乘已。然欲極其致，又不能不有多讀書多窮理之素養以蓄之，示人宜充盈意識界之才識，以孕育靈感之茁發，而邀致其映現也。一旦別材久蘊，別趣羣生，發而爲歌詩，庶幾可以一唱三歎，言有盡而意無窮焉。假論於禪，非然者不能盡其理之奧蘊也；詆爲『謬語』（馮班嚴氏糾謬），非惟不知滄浪，乃亦不知詩矣。

嚴羽雖主別材別趣，然未嘗遽置情性與思想也。意謂詩之所以爲詩，在其蓄思想，詠情性，藉興趣表而出之，不故作招搖之態而已。明清以來，創作者一仍舊貫，不能自制新聲。學唐步宋，偏促如轅下之駒，所就殊渺。批評者率亦各照隅隙，不識其全。揭櫫名目，以示精強；卒以偏驚，而致偏廢。且凡有持議，皆屬直接或間接淵源於昔人之論者。前賢堂構已成，後人雕績而已。

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云：「詩必有具眼，亦必有具耳。眼主格，耳主聲。聞瑟而知爲第幾絃，此具耳也；月下隔窗辨五采線，此具眼也。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，予曰：『試以所未見詩，即能識其時代格調，十不失一，乃爲有得。』」東陽著『格調』之說，主張作家各有其獨特之風格，不相雜廁，猶曹丕論『氣之清濁』也。又云：「法度既定，溢而爲波，變而爲奇，乃有自然之妙。」作者自稟其個性，溢變而形成文學之風格，固自然而生者，非力強可致也。王世貞藝苑卮言云：「才生思，思生調，調生格；思即才之用，調即思之境，格即調之界。」『才』云個性，『思』云情思，『調』云想像，『格』云風格也，則變積東陽格調說而發揮之者。

沈德潛於詩亦主格調。說時碎語云：「詩貴性情，亦須論法，亂雜而無章，非詩也。然所謂法者，行所不得不行，止所不得不止，而起伏照應，承接轉換，自神明變化於其中。若泥定此處應如何，彼處應如何，不意運法，轉以意從法，則死法矣。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，月到風來，何處著得死法？」一段議論，正可作西涯『溢變自然』說之注腳。又云：「性情面目，人人各具。讀太白詩，如見其脫屣千乘；讀少陵詩，如見其憂國傷時。……倘詞可餽貧，工同馨悅，

而性情面目，隱而不見，何以使尙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？」又可作東陽『具眼具耳』之說解矣。風格云者，作者之情韻決定其思路擴展之方向，而形於詩者，遂以有其獨特之點也。此自文學感情與想像方面之一肢節，且創作者亦時有風格之正變，未宜擅此一理以衡量所有作品，而遽議臧否於其間也。

王士禎則標『神韻』之說。香祖筆記云：「表聖論詩，有二十四品，余最喜『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』八字。」遂亦奉此八字爲心法焉。其唐賢三昧集序，亦服膺司空圖之論『味外味』、嚴羽之論『興趣』。錄唐賢之詩，以虛寂爲超詣，含蓄爲雋永，具見其論詩之指歸。

鄭方坤清詩家名人小傳云：「王士禎：尤經營於陶孟王韋諸家，獨得象外之旨，絃外之音。……蓋自來論詩者，或尙風格，或矜才調，或崇法律，而士禎獨標神韻。神韻得，而風格才調數者，悉舉諸此矣。」所云『象外之旨，絃外之音』，猶表聖之辨酸鹹以外味，餽卿之謂空中音，相中色也。然而表聖詩品，未嘗專主一格；滄浪詩話，亦非盡祛情思。迨漁洋之身，乃獨明一節，其與格調，性靈之論，何能『悉舉』，蓋亦鼎峙而已。

四庫書目唐宋詩醇提要云：「國初多以宋詩爲宗。宋詩又弊，士禎乃持嚴羽餘論，倡神韻之說以救之。故其推爲極軌者，惟王孟韋柳諸家。然三百篇、尼山所定，其論詩一則歸於溫柔敦厚，一則謂可以與觀群怨；原非以品題泉石，摹繪煙霞，泊乎喻士逸人，各標幽賞，乃別爲山水清音；實詩之一體，不足以盡詩之全也。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，故意言並盡，流而爲鈍根。士禎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，故光景流連，變而爲虛響。」所論爲允。神韻之說，得文學想像與思想之部份，而思概其全。人生而稟七情，發之中節，皆可以爲至文，奚必閒適之趣，溫穆之辭？阮亭之偏，不待觀縷矣。

袁枚論詩，乃力持『性靈』之說。答施蘭垞書云：「詩者、各人之性情耳，與唐宋無與也。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，是己之胸中，有

已亡之國號，而無自得之性情，於詩之本旨已失矣。」隨園詩話云：「凡詩之傳者，都是性靈，不關堆垛。」續元遺山論詩絕句云：「天涯有客號吟癡，誤把鈔書當作詩，鈔到鍾嶸詩品日，該他知道性靈時。」言均甚辨。獨惜其流連忘返，寢成瀉薄之音，因道入魔，偏嗜泥塗之趣耳。答沈大宗信論詩書云：「所云『詩貴溫柔，不可說盡，又必關係人倫日用。』此數語有褒衣大袈裟象。僕口不敢非先生，而心不敢是先生。何也？戴經不足據也，惟論語爲足據。子曰：『可以興，可以群，』此指含蓄者言之，如柏舟，中谷是也。曰：『可以觀，可以怨，』此指說盡者言之，如『豔妻煽方處』、『投界豺虎』之類是也。曰：『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』此詩之有關係者也。曰：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』，此詩之無關係者也。僕論詩常折衷於孔子，故不得不小異於先生。」小智自封，諛然而沸，逞情率易，流弊無窮，性靈之說，謂發抒情感爲詩之性，表現想像爲詩之靈。信之既篤，尊之太甚，遂主張觀與怨不恤其說盡。其始也因性靈之善發，而形諸吟詠；其繼也抽性靈之乙乙，而強以拘詩；其終也乃以鄙吝爲性，而以捷給爲靈矣。不謀藉理性之思想以繩持其感情，獨縱任其想像之奔騰，以遂其感情之偏險。必踰閑蕩檢然後以爲高，日就於褊淺淫靡而方自鳴得意。云是性靈爲本，轉達立誠之真。袁氏爲詩，正坐斯病，由此猖狂之臆念導之耳。

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：「無論作詩作詞，不可有腐儒氣，不可有俗人氣，不可有才子氣。人第知腐儒氣，俗人氣之不可有，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也。尖巧新穎，病在輕薄；發揚暴露，病在淺盡。腐儒氣、俗人氣，人猶望而厭之；若才子氣則無不望而悅之矣，故得病最深。」足資子才之針砭。亦峯論詞，崇尚沉鬱之作，亦可以救性靈說之偏蔽。其詞話又云：「作詞之法，首貴沉鬱，沉則不浮，鬱則不薄。顧沉鬱未易強求，不根柢於風騷，烏能沉鬱？十三國變風，二十五篇楚辭，忠厚之至，亦沉鬱之至，詞之源也。不究心於此，率爾操觚，烏有是處。」鬱則不薄，忠之至者，感情之真也；沉則不浮，厚之

至者，思想之善也。淳蓄溫潤之思想以網維奔放之感情，而出之以忠厚，陳氏之所云沉鬱也。以視袁氏之輕薄浮誇，有君子小人之判矣。惟既推崇沉鬱之甚，遂視含蓄者爲佳什，英銳者爲淺露，未達於文章隱秀各有工之致之旨也。且於所推崇者，往往繫之君國，歸諸尚用，亦矯枉而過正矣。

綜觀『格調』、『神韻』、『性靈』、『沉鬱』諸說，皆指認一斑爲全豹者。得在析之愈精，持之有故；失在執一繩萬，捫燭扣槃。惟翁方綱標持『肌理』，可以救格調之失，拯神韻之虛；亦緣視野較爲寬濶，不局一隅，能及文學情思文質之全也。其神韻論云：「善教者必以規矩焉，必以殼率焉。神韻者，以心聲言之也；心聲也者，誰之心聲哉？吾故曰：先於肌理求之也。知於肌理求之，是刻刻惟規矩殼率之弗若是懼，又奚必其言神韻哉！」追心聲之所主，探文學感情思想之本源也；求肌理之貼切，取想像形式之有所歸依也。神韻說是着眼於高遠處，肌理說則是着手於卑近處也。又云：「神韻無所不該，有於格調見神韻者，有於音節見神韻者，亦有於字句見神韻者，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。有於實際見神韻者，亦有於虛處見神韻者，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，亦有於情致見神韻者，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。」『情致』猶云感情與想像，『高古渾樸』源於思想；『虛處』言文，『實際』言質；『音節字句』謂形式也，『格調』謂因情致形成之風格也。則所云神韻者，情辭表裏相與糾纏而成其動人之實者之謂也。雖然，要非漁洋之所謂神韻矣。故其均堂詩集序云：「漁洋所以拈舉神韻者，特爲明朝李何輩之貌襲者言之，此特舉其一端，而非神韻之全旨也。」翁氏能兼綜並採，遂以得其環中而輻輳相成，是其長；爲補弊救偏，因亦懸的甚邇，論法太拘，是其短耳。

舊日之說詩者，代相沿襲，意有所囿，大抵偏駭者不免濶略，精強者獨伸一節，殆亦時代使然也，近世梯航大通，人文綜合，論詩者融貫古今，溝通中外，自出新意，駸駸乎可以凌駕昔人矣。

王國維人間詞話云：「詞以境界爲最上。有境界，則自成高格。

蒼山洱海之間

汪懋祖

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以鄰於理想故也。……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，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，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，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。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普物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，否則謂之無境界。……滄浪所謂『興趣』，阮亭所謂『神韻』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『境界』二字為探其本也。」所云『境界』，即表現於

作品之意味，其構成之因素為真情感真景物，情景相織而意象出。真感情者，作者自抒其喜怒哀樂之情，無所矯揉於其間；且必出自既往經驗之反省，即所云『構造必從自然之法律』也。真景物者，作者之思想為詩材之素底，想像供感情之驅役，然後構成對於形相之直覺，即所云『遺其關係限制之處』也。既表現之於歌詩，詩中必孕有作者之情思與想像——即其整個之生命，而自成一種完整之境界。故王氏拈出『境界』二字，探其本亦咳其全矣。王氏之論，現代詩說之發軔耳。後來者居上，歧予望之。

一 大理地勢及古名考釋

大理為滇西第一重鎮，自下關至上關九十里，蒼山十九峯屏列如弓形，拔海四千公尺。東界洱海，湖面寬約十二三里。河北兩端，因峽設關，中開一壩，四塞為固。自下關西行，以天生橋為第一屏障，東去以定西嶺為第一屏障，大理鎮於蒼洱之間。在昔平面戰爭時代，自可憑險據守，亦有陷於絕地之危險。但蒼山十九峯間山徑可抄者正多。明洪武間藍玉、沐英攻下關不克，乃命王弼等趨上關；別遣胡海夜從間道渡河，繞出點蒼山後，緣崖而上，立旗幟。昧夾軍在下關望見之，皆譁噪，蠻眾驚亂，遂斬關入。唐伐南詔，兩度覆沒士卒二十萬人。此時南詔盛強，以逸待勞。亦因唐將領輕敵，不諳地勢，攻其正面，遂致覆敗也。

史記西南夷列傳：「西南夷君長以什數，夜郎最大。其西靡莫之

屬以什數，滇最大。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，邛都最大。此皆懸結耕田有邑聚。其外西至同師以東，北至葉榆，名為嵩、昆明。……皆編髮隨畜遷徙，亡常處，亡君長，地方可數千里。」案同師當今永昌，葉榆即大理。漢武帝通西南夷置益州，分設七郡，以滇王故地為益州郡。後漢永平二年於益州西部設永昌郡，葉榆隸焉。永平十年又設嵩唐都尉，鎮哀牢夷其地當在永昌與葉榆之間。又案史記上文所稱嵩、昆明，係該地範圍內代表部落之名稱，而非若「滇」已為確定之地名。但滇在東，昆明在其西，地方故自分明。滇以滇池著，葉榆原為澤名，即今洱湖也。全祖望昆明池考：「通鑑唐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，昆彌即昆明也。時有西瀾河蠻，東瀾河蠻之稱。是昆明之當在大理無疑。」由是知昆彌即昆明，瀾河即洱湖，「瀾」與「洱」為音譯之轉變。案雲南音多鼻音，讀「昆明」二字，確如「昆彌」，因切水故作瀾。今作「洱」或能由「爾」音之轉變。舊籍多稱洱湖似人耳之形，